

明清黔东南书院研究

王雨睿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出版集团



明清黔东南书院研究

王雨容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黔东南书院研究 / 王雨容著.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1-12698-6

I . ①明… II . ①王… III . ①书院—教育史—贵州省—明清时代 IV . ①G649.29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4123号

明清黔东南书院研究

责任编辑 刘泽海

装帧设计 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21-12698-6

定 价 32.00元

投稿邮箱 haiyang380@126.com

自序

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中，除官学和私学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机构，即书院。书院是存在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有着自身特有的机构体系和功能，尤其有很强的区域特征，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书院入黔以来，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多种多样的学术思想，也从多方面给黔东南地区文化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研究书院在黔东南的发展情况，对今天的黔东南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都对偏远于西南一隅的黔东南书院很少关注。关于黔东南书院的研究，前人的成果大都是针对黔东南书院个案进行研究，而研究的重点又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书院，还没有对黔东南的书院有过专门、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谈书院对黔东南区域文化的影响则还是空白。因此，本书拟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抛砖引玉。

黔东南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太仆卿周瑛归里后所创修的黄平草庭书院。其后各府、州、县相继设立书院，聘师讲学。清乾隆、嘉庆两朝为主要发展期，苗疆五厅各设书院讲学。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天柱白云书院最后成立

时，共发展到70余所。明清黔东南书院的教育教学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对黔东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在对明清黔东南书院的数目考证、时空分布等方面统计的基础上，研究黔东南书院的管理模式，包括教学管理、组织管理、日常活动等，然后再对清代黔东南书院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行论述，谈两个方面，一是书院改制问题，二是书院与地方乡绅的关系。之后，再论述明清黔东南的书院对黔东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分别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层面研究明清黔东南书院带给黔东南文化的影响。

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明代黔东南书院

考证黔东南书院在明代的发展情况。明代，黔东南有草庭书院、天香书院、学孔书院、南山书院、紫阳书院、兴文书院、凤山书院。分别探究相关书院的发展情况与教学活动情况。

第二章：清代黔东南书院

探究清代黔东南书院的发展情况。清代黔东南书院有黎平的印台书院、南屏书院，锦屏龙标书院，古州榕城书院等。分别对这些书院进行考证并探究其教育教学情况。

第三章：清代黔东南书院的管理和日常活动

从教学管理、组织管理、日常活动等方面来把握清代黔东南书院的内部发展模式和特点。

第四章：黔东南书院发展与地方社会

首先谈清代黔东南书院改制问题，其次论述地方乡绅与书院的关系，探究地方乡绅如何参与书院的各种活动。

第五章：明清黔东南书院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分别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层面探讨书院对黔东南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

黔东南，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本身教育不是很发达，明清时期的书院也不是很有名，可探讨的东西相当有限，加之文献资料匮乏；笔者囿于学识浅陋，要对明清黔东南书院作深入的研究，无疑困难重重，此书如能对地方文化作一丁点贡献，私愿足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明代黔东南书院	9
第一节 明代黔东南书院的发展规模	9
第二节 明代黔东南书院的时空分布	13
第三节 明代黔东南书院的选址和建筑风格	17
第四节 明代黔东南书院的教育特点	21
第五节 书院与明代黔东南学术、科举	35
第二章 清代黔东南书院	53
第一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发展规模	59
第二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时空分布	77
第三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选址和建筑风格	85
第四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等级差异	103
第五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与学术、科举	107

第三章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管理和日常活动	143
第一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组织管理	143
第二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经费管理	158
第三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的日常活动	168
第四章 黔东南书院与地方社会	181
第一节 书院与地方官绅	181
第二节 清代黔东南书院改制与地方社会	187
第五章 明清黔东南书院与区域文化	206
第一节 书院的教化作用	206
第二节 物态文化层面	214
第三节 制度文化层面	219
第四节 心态文化层面	239
参考文献	248
附 录	255

前 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研究书院，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说，书院在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管理制度等等方面，都给现代的教育提供了太多的经验，留下很多的启示。事实上，古代很多思想都产生于书院，比如宋代的程朱理学，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①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朝，本义是指藏书修书的地方。据史载，唐朝开元六年（718年）设置丽正修书院就有了“书院”的名称。唐中期及五代，书院渐渐转化为私人藏书、读书、讲学的地方。及至宋朝，私人讲学风气以及理学兴起，书院遂多成为民间讲学的地方，教学功能凸显，不仅仅限于藏书了。书院成为古代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长期以来，对古代书院存有多种说法。有“高于蒙学说”（《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2期）和“古代大学说”（李才栋《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研究书院的价值》发表于《教育研究》1985年10期）。在中国历史上，书院独特的教育方式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区域文化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对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书院对湖湘文化、江浙文化

① 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对黔东南区域文化的形成而言，同样意义重大。为了正确认识黔东南文化的形式及其特点，本文以《明清黔东南书院研究》为题，从书院教育发展的角度切入，对黔东南区域文化的形成进行探讨。

近年来，研究书院的学者及其论著很多。他们或者对中国书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总结书院特征并加以论述；或者从地域角度研究中国书院；或者对中国书院进行个案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了书院史的研究。其中通论性的研究著作有陈元晖等的《中国书院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2月版）、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等。对中国书院进行断代研究的作品有：邓洪波的《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05期）、郑余的《宋代书院教育管理模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81期）、史明的《明末书院的创建与毁禁》（《齐鲁学刊》1996年03期）等。从地域角度研究中国书院的有：陈业强的《广西书院研究》（《广西地方志》2004年02期）、黄兆宏的《甘肃书院诸问题探讨》（《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04期）等。对中国书院的个案研究有：李化斓的《郑公书院》（《管子学刊》2004年03期）、王勋成的《兰山书院之始末》（《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05期）等。还有从书院的学术特点、管理制度、文化名人对书院的影响等多视角的探讨的著作。

关于贵州书院的研究仅有谭佛佑、张羽琼、黄小曼、何静梧等学者。谭佛佑的《贵山书院始末述略》（《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03期）中论述了清代贵山书院“贵山三先生”留下了宝贵的办学经验；谭佛佑的《论明代贵州置省前后文化教育

事业的发展及其归因》（《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03期）中，对贵州书院繁荣原因进行了探讨。张羽琼教授著有专著《贵州古代教育》，其中第二章明代贵州教育的蓬勃兴起中的第三节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中对明代贵州的书院的发展状况、发展特点以及书院的教育管理情况进行过梳理和总结；《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4月）论述了明政府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建立的官方教育体系以及民间教育的兴盛促进了贵州文化发展的情况；《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月）一文对明代书院教育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作用作出了卓有见地的评价；在《王守仁与明代书院的复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三期）一文中对王守仁促进贵州书院的繁荣作出了论述。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中在第二章明代贵州教育中的第三节书院制度的建设论述过书院的创办和讲学，并且对明代贵州书院和科举中进士人员的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梧木的《贵阳“文明书院”今何处》（《贵阳文史》2006年01期）、王路平的《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孔子研究》2000年06期）及《王阳明主贵阳书院正误》（《浙江学刊》1997年06期）、黄小曼的《王阳明在龙场》（《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03期）、何静梧的《王阳明在贵阳的踪迹》（《贵阳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02期）等也对贵州的书院做了多方位的论述。此外还有湖南大学的向振湘的硕士论文《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介绍了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书院的讲学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学者学为圣人”、“学贵自得”、“知行合一”等独到见解，都对贵州书院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

书院入黔以来，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多种多样的学术思想，也从多方面给贵州地区文化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研究它对今天的贵州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都对偏远于西南一隅的贵州书院很少关注。关于贵州书院的研究，前人的成果大都是针对贵州书院个案或者断代性地进行研究，而研究的重点又是集中在贵阳附近的书院，还没有对黔东南的书院有过专门、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谈书院对黔东南区域文化的影响则还是空白。

本书首先对明清、黔东南、书院等几个关键词进行界定。

明清时期，指的是从明朝建立之时，即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到废除书院制度的1901年为止。

黔东南在秦以前属于“西南夷”的一部分。秦统一后，设置郡县。以清水江为界，北部属黔中郡，南部属象郡。两汉时，施秉以东属荆州武陵郡无阳县境，东南部的锦屏、黎平属武陵郡坛城县地，黄平以西属益州牂牁郡且兰县范围；榕江、从江在交州郁林郡定固县北端。其疆界沿至三国和两晋时期。迨至南朝分荆州地置郢州，辖武陵郡，改无阳县为舞阳县。析牂牁地置南牂牁郡，该郡的东部辖至凯里。

隋统一南北，整建地方郡县，复牂牁郡。岑巩、三穗、榕江、从江以西属牂牁。天柱、锦屏、黎平以东地方属沅陵郡龙标县边陲。李唐开元，改“郡”为“道”。贞观建思州。置应州、兗州、亮州等羁縻州，隶黔中道。今施秉以西属黔中道琰州；以东属岭南道边陲。至五代时期，诸帝争夺中原，边州割据，拒绝朝贡。相沿至宋，改“道”为“路”。夔州路辖

有思、犍等州；荆湖北路辖有天柱、锦屏、黎平。思州治务川，领务川、安夷（镇远）、邛水（三穗）三县。

元代改路为行省，在民族地方实行土司制度。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思州安抚司，隶湖广，旋改宣抚司、宣慰司。至正年间，分置思州、思南两部。领总管府、军民总管府，安抚司、宣慰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以民族首领为长官，世袭土职。麻峡（麻哈）县隶属湖广行省顺元宣慰司。凯里、黄平隶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

明代洪武年间，沿袭土司制度。朝廷镇压古州（黎平）农民起义之后，整建土司，增设土官，解除土人之职，遴选随征军士充任，世袭土职。军事设卫所，驻重兵弹压。永乐十一年（1413年），朝廷平定思南、思州之乱，始建贵州行省。析两司置思州、新化、黎平、镇远等8府。建永从、施秉、清平、天柱四县和黄平州（系散州，县级）。在府州县设流官，领土司，实行土流并治。麻哈（麻江）州、清平县隶都匀府；天柱县隶湖广靖州府。把军政分设，以卫隶湖广，以府属贵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定播州，析地置黄平州、凯里司，隶平越军民府，属贵州。

清代康熙年间，并偏桥、镇远卫入施秉、镇远县；雍正年间，改五开、铜鼓、清浪卫置开泰、锦屏、青溪三县，隶于贵州，使军政统于一省。雍正七年始“开辟苗疆”，建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5厅（散厅，县级），领土司、土舍，分隶都匀、镇远、黎平3府。军事设镇、协、营、汛，置堡屯田，防范苗疆。麻哈州、清平县隶都匀府辖。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华民国建立，方消除绿营、土司、屯堡制度。

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改府、厅、州为县。

黔东南州，1956年7月23日建立，辖凯里市和镇远、天柱、锦屏、岑巩、施秉、麻江、三穗、台江、榕江、从江、黎平、丹寨等十五个县。秦隶黔中郡、象郡，汉属武陵两郡，唐属黔中道。元置镇远府及古州、八方、上里坪等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明清为黎平、镇远等府地。

书院概念的界定，因研究者认识的偏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先举几个工具书中的定义。比如《教育百科辞典》里是这么解释的：“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多为著名学者私人创造或主持的高等学府。其名始于唐代丽正修书院，为官方修书、校书、藏书的场所。亦有某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称为书院。如皇寮书院、松州书院、梧桐书院等。至宋代大兴，出现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创办者或是私人，或是官府，多择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有众多知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自由研习、相互辩难、集众讲解等多种方式，以修习讨论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元代书院非常多，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明清书院仍盛，但多为准备科举的场所，清末改革教育制度，改为各级学堂。”^①这个定义更注重书院的讲学功能。《教育大辞典》则如此定义：“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唐开元六年（718年），朝廷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原为修书校书藏书之所。时私人隐居读书或聚徒讲学之地亦有名书院或精舍。书院继承发展了古代私学传统，吸取宗教特别是禅林精舍讲学制度和官学经验，成为与官学相平行发展且具有相独立性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程度一

^① 张念宏主编：《教育百科辞典》，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

般在蒙学之上，或为本地、本省最高学府，或属于族学、义学、私塾性质，开展学术交流、图书篆刻等活动，成为培养人才，发展学派的地方文化教育中心。提倡自由讲学，不同学派互相交流。读书与修养并重，教学与研究结合，师生关系融洽。形成了特色的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和学田、学规等各种管理制度。”^①这个定义则重点谈了书院的教育功能。再来看看一些学者的定义，李国均的《中国书院史》说：

“书院教育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②李氏的定义谈了书院的讲学和教育两种功能。邓洪波认为：“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③邓氏的定义则扩大了书院功能，凡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都包括在内。以上的定义，都从书院的功能入手进行阐释，书院的功能主要是藏书、讲学，同时还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即祭祀功能。

黔东南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太仆卿周瑛归里后所创修的黄平草庭书院。其后各府、州、县相继设立书院，聘师讲学。清乾隆、嘉庆两朝为主要发展期，苗疆五厅各设书院讲学。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天柱白云书院最后成立时，共发展到40余所。明清黔东南书院的教育教学虽然是潜移

①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李国均：《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默化的，但是对黔东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项目在梳理明清黔东南的书院之后，再重点论述明清黔东南的书院对黔东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分别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层面研究明清黔东南书院带给黔东南文化的影响。

第一章 明代黔东南书院

黔东南属于边远地区，在明代之前，贵州还未建省，教育发展极其缓慢，南宋绍兴年间，思州的沿河地方，建有一所学校，叫鸾塘胜院。在贵州建省以前，黔东南属于湖广，加之处于边区，没有得到重视。郭子章在《黔记》里说：“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①明代，贵州建省，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黔东南教育随之勃兴。首先是官学的兴起，随后各种民间教育也在官学的推动下，发展起来。黔东南教育在贵州教育发展的这种大环境下，也开始发展起来。对黔东南书院的统计考察难度很大，一是数量极其有限，名称更迭频繁，兴废迅速，存在时间也不确定；二是明朝政府对书院的打击，多次废止；三是有关资料严重缺失。

第一节 明代黔东南书院的发展规模

明代建立初期，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明朝统治者吸收前代灭亡经验，注意与民休息，减轻赋税，解放工奴，使生产力水平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也逐渐繁盛起来，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① 《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